

1934：红军不怕远征难

——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主力开始长征

□ 王贵胜

1934年，中共中央领导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

长征，是中共党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出版的《人类1000年》一书，公布了公元1000年至公元2000年1000年间人类历史进程中发生的100个重大事件，中国入选了3个，其中之一就是1934年的长征。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气吞山河的英雄壮举，是中华民族英勇奋斗的壮丽史诗。

（一）

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全会讨论了博古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继续坚持过左的土地政策，将“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博古仍负总的责任。



通道会议纪念馆雕塑

此时，经过半年多准备的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决定首先以50万兵力，分几路“围剿”中央根据地的红军。1934年1月，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起异常凶猛的军事进攻。4月，国民党军队逼近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中央苏区在军事上已陷入四面合围。

面对国民党重兵进攻，毛泽东、张闻天等人都不主张红军与敌军死打硬拼。但博古信赖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没有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坚持“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战法，命令红军主力坚守广昌。博古和李德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要求红军同敌人“决战”。红三军团团长彭德怀愤怒地讲：“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

4月27日，国民党军向广昌发起总攻。当晚，红军被迫撤出广昌。广昌战役持续18天，是第五次反“围剿”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一次战役，红军伤亡5000多人，占参战总兵力的1/5。这次战役的惨败，宣告了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法彻底破产。

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决定。随后，中央将这一决定报告了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

（二）

1934年7月，国民党调集31个师的兵力，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发起全面进攻。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在于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狭小的区域之内，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已成定局。

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

1934年10月10日，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重要日子。当天，中革军委发布命令：由中央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军委第一纵队”，总人数4600余人，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委；由中央党政军机关、卫生部、后勤部、总

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军委第二纵队”，总人数9800余人，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

中央红军参加战略转移的主力部队，总人数86万余人。10月17日，中央红军主力出发了。毛泽东感慨万千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走出中央苏区了。这一天，参加长征的每个人并不知道，人类历史上一次惊心动魄的军事远征就要开始了，踏上征程的每一个红军都将成为前所未有的英雄史诗的主人公。

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领导机关叫“中央分局”。最先被确定留下的“中央分局”的领导人是：项英、陈毅、贺昌、瞿秋白、陈潭秋，其他留下的高级干部是：何叔衡、刘伯坚、毛泽覃、古柏等。这些人都明白，留下来就意味着九死一生。后来，他们领导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三）

中央红军的行进方式是“甬道式”。走在队伍中间的是两个军委纵队，在其前后左右，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

通路，11月8日，红军通过了汝城以南地域。在粤军和湘军混乱而单薄的防守中，红军通过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突破的第三道封锁线，是湘南良田、宜章间的湘军防线。

由于中央红军通过两道封锁线很快，致使何键部因时间仓促，分散于衡阳以南的粤汉铁路、湘桂公路上各要点的兵力，来不及向湘粤边境靠拢。11月15日左右，红军全部通过良田至宜章间的第三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突破的第四道封锁线，是桂北全州、兴安间的湘江防线。

这是蒋介石真正清醒过来之后，精心布置的一道防线。11月12日，在红军向第三道防线挺进之际，蒋介石发布命令：以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指挥湘军与中央军16个师77个团“追剿”中央红军。国民党军队五路大军近25万兵力，前堵后追，左右侧击，向中央红军实施四面合围，于湘江东岸与红军决战。能否突破湘江防线，红军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中央红军西渡湘江的渡口，在广西东北部的全州到界首之间。1934年11月27日，军委纵队距离湘江渡口界首还有80公里。因没有轻车简从，80公里的路竟然走了整整4天。这种缓慢行军，让红军官兵在湘江上构成的一条走廊式通道等待了3天。中国革命异常惨烈的战斗在这3天发生了。

11月29日，周恩来和朱德赶到湘江边上的界首。根据他们的计算，即使到12月1日，军委纵队也不可能全部渡过湘江。此时，湘军进攻兵力超过红军阻击兵力的10倍以上。周恩来和朱德要求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无论如何要把敌人顶住，确保湘江上的通道完整和畅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的电报中讲：“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

11月30日上午，军委纵队的人马陆续到达湘江渡口。12月1日，中央红军阻击阵地上的告急电报一封接着一封，阻击战到了白热化状态，决定党中央和红军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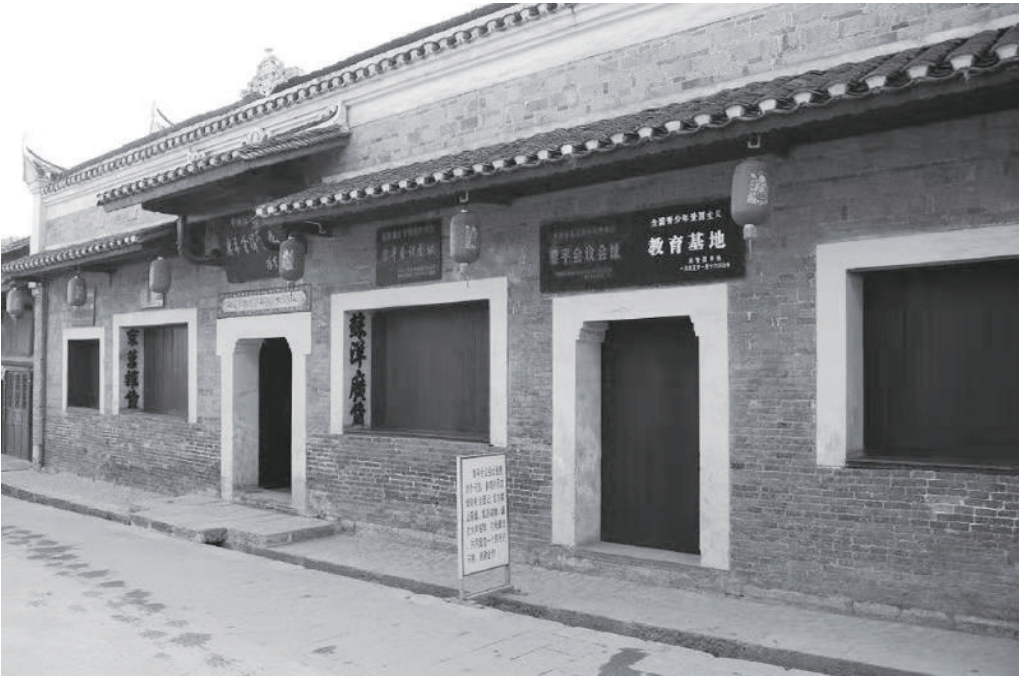
红一军团第二师在距离全州16公里处的脚山铺一带构筑了第一道阻击阵地，冲击上来的湘军黑压压的一大片，把整个山坡都盖满了。湘军一轮又一轮地冲击，红军一次又一次地反击，厮杀声整整一个白天没有间断。聂荣臻政委提出战斗口号：生死存亡在此一战。

红三军团第五师奉命在距离湘江渡口70公里的新圩构筑阻击阵地，这是桂军向北攻击湘江渡口的必经之地。军团长彭德怀给师长李天佑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在这里坚持4天。战斗异常惨烈，师参谋长牺牲了，师长李天佑拿起驳壳枪冲出指挥所，政委钟赤兵在15团团长、政委都负伤的情况下，冲出指挥所向15团的阵地冲过去。

红三军团第四师在界首构筑阻击阵地，这里距离军委纵队的渡江地点只有几里地，这里被烧成一片火海。位于最前沿的10团团长牺牲后，军团长彭德怀冲出指挥所奔上前沿，被在第四师前沿指挥的师政委黄克诚拦住。

第八军团是中央红军长征之前在苏区仓促组建的部队，几乎全部由没有任何战斗经验的新兵组成。这个军团的阻击战打得特别惨烈，这支从中央苏区出发时1万多人的部队，最后回到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战斗人员只剩下1600人。

红五军团在掩护军委纵队安全的同时，还要掩护第八、第九军团向湘江渡口方向移动。



黎平会议会址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

红五军团第34师一直担负中央红军的后卫任务，在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之后，被阻止在湘江东岸，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在昏迷中被俘。他躺在担架上，从腹部的伤口处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壮烈牺牲。

到12月1日下午5时30分，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经此一战，中央红军由苏区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中国工农红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中国革命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四）

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配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央派出了两支队伍。周恩来称他们，“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1934年7月6日，红七军团3个师共6000余人，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下，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冲破两道封锁线之后，进入闽浙赣苏区，企图调动敌“围剿”部队回援，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1934年11月4日，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七军团与红十军会合后，合编为红十军团。12月14日，在谭家桥战役中，寻淮洲壮烈牺牲。12月20日，红十军团在怀玉山陷入敌军重围。1935年1月16日，粟裕、刘英等率领800多名官兵突出重围，方志敏被俘，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红十军团余部在粟裕、刘英率领下，突破重围。转战到浙南，开辟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命令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8月7日，红六军团开始战略转移。10月24日，红六军团各部转战80余天、行程5000里之后，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主力在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会师。10月26日，在四川省酉阳县南腰界举行庆祝大会。两支部队会师后进行整编，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萧克续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王震任政委。11月24日，中革军委来电，要求两个军团深入湖南中部和西部，最大限度地调动湖南境内的国民党军队，以减轻中央红军方向的军事压力。长征路上，中央红军曾试图与他们会合，但这条路已被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无法走通。

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后，其他红军也进行了军事转移。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撤离后，1933年1月到达四川北部与陕西、甘肃的交界处，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9月，20万川军“围剿”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奋起反击，至1934年2月，双方在战场上形成僵局。1934年6月，20万川军向万源发动进攻，这是关系川陕根据地红军生死存亡的最后一战，红四方面军5个军参加了这场空前惨烈的战斗。8月份，红四方面军发动总反攻，采取猛烈攻击和长距离迂回战术，使川军全线崩溃。1934年底，万源保卫战结束，红四方面军在枪林弹雨中生存下来，下一步将迎接更严峻的战斗。

1934年11月11日，在敌军进行围攻的情况下，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红25军主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转到外线开辟新的根据地。11月16日，在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领导下，红25军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西越平汉路，进入桐柏山区，开始西征。他们一路拼杀，转移伏牛山，奔袭紫荆关，北出终南山，翻越六盘山，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红27军会合，共同为后来的中央红军开辟了一块落脚的根据地。

与此同时，党领导的其他武装力量也在积极开展活动。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杨靖宇为军长兼政委。此后不久，又先后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三、六军和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汤原游击总队等。这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基本武装力量。

（五）

湘江战役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广大干部、战士对中央军事指挥错误的不满达到顶点。这时，毛泽东在与张闻天、王稼祥反复交换意见之中，做通了他们的工作，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毛泽东后来说：“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有一票。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首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

1934年12月12日，中央领导人召开通道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李德主张从通道向北，与转战在湖南西部的贺龙、萧克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坚决反对，认为国民党军队已在那个方向部署重兵，力主西进，向敌军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个建议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通道会议的当天，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布了西进贵州的命令。这是近一年多来中共中央第一次集体否决了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意见，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高层会议上获得多数赞成。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周恩来以主持者的身份，采纳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想法，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提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至此，红军的行军方向从根本上扭转了。6天后，中央红军向遵义方向移动。

1934年最后一天，中央政治局召开猴场会议。博古、李德企图否定黎平会议的决定，与会者认为，黎平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无条件地执行。会议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上面这三次会议，为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作了重要准备。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即将翻开崭新的历史篇章。

从创建共产党到
成立新中国

